

精讲

插画:何朝霞

责编:范亚湘
美编:何朝霞
校读:李乐

正因为历任潭州知州的接续发力,长沙儒学之风冒炽,民风得以淳化,破天荒地涌现出了一个人才“小高峰”。宋时,越来越多的长沙人迈着自信、坚毅的步伐,昂首走上历史的舞台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……

天下之势,不盛则衰。到了五代十国后期,宋之一统,势不可挡。

后周广顺元年(951年)十月,马楚王朝再次陷入兄弟相争。南唐趁机攻入潭州(长沙),马楚灭亡。不及一年,湖南本地军阀合力将南唐军队驱走,随之在朗州(常德)设立武平军节度使,统治湖南并继续向中原后周政权称藩。

北宋建隆三年(962年),通过“陈桥兵变”逼迫后周禅让登位的赵匡胤已坐稳中原,正待开疆拓境。经历了四任三姓节度使的武平军政权自以为“奄有湖湘,兵强谷阜”,谁也不敢奈何。可就在这年十二月,潭州等地发生内讧,湖南乱哄哄地打成了一锅粥,武平军政权不得不请求宋军急来平乱。

一个要补锅,一个锅要补,岂不正好!赵匡胤伺机调遣亲信大将慕容延率兵南下,宋军以“假道灭虢”之策先是扫平了南平(荆州)政权,之后,策马越长江,直捣长沙。次年二月,长沙城头插上了红底黄字的慕容旗,长沙乃至湖南平复,悉数纳入宋之版图。

没过几日,自唐宋以来深受军阀粗暴统治的潭州百姓,陡然见证了稀罕之事:一个头戴方鼎硬骨长翅帽、身着紫袍、手端鞞带的文人官员,在一干人马的簇拥下,神摇意夺地走过了街头……没错,这个文人官员就是北宋首任潭州知州吕余庆。

潭州知州也称潭州知府、潭州太守,全称“权知潭州军州事”。宋朝州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之职责和唐朝差不多,主管全州军政、民政事务,简称知州或知某州。不过,潭州知州和潭州刺史一样,代替湖南军政,兼任荆湖南路(后改为湖南)安抚使,统辖潭州、衡州(衡阳)、道州(道县)、永州、邵州(邵阳)、郴州、全州之7州军政事务和武冈军及桂阳监(南宋增茶陵军)。

《宋史·吕余庆传》曰:“余庆当太祖居藩,历任幕府。”吕余庆不仅有才干,且为人厚重简约,早年就交好赵匡胤,并深得赵之信任。故而,吕余庆出官首任潭州知州,能让远在汴京(开封)的赵匡胤放心。

只不过,吕余庆在长沙还没完全展开手脚,第二年就因升迁回到了开封。

是谁接替吕余庆?历史资料里一片空白。

开宝三年(970年),王祐知潭州。《宋史·王祐传》曰:“祐少笃志词学,性倜傥有俊气。”“下瞰虚空绝洞,上排烟雾倚山颠。”诗狂直欲吞云雾,酒渴何妨吸洞庭。”并非王祐不优秀,而是其性情决定了志在山水、诗酒。好在开宝七年(974年),朝廷派来了朱洞接任潭州知州。

初冬的岳麓山层林尽染,风吹过,枫叶在枝头跳动得狂烈、绚烂,仿若山林被点燃了。满是灿烂的希望之光。幽深雅静的岳麓山东麓,坐落着一片古色浓郁、蔚为壮观的建筑群,虽已历经千年,仍是弦歌不绝,这就是中国“四大书院”之一的岳麓书院。

南宋淳祐年间(1241—1252年)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著《赠了敬序》说,在唐玄宗那阵,岳麓书院还只是一座小型佛寺。五代十国之时,可能也是在这枫叶如丹的时刻,“一名智瑜,一名某”两位僧人来到这座佛寺参道修行,没过多久,两人颇感“湖南偏僻,风化陵夷,习俗暴恶”,常常“思见儒者之道”。于是,他们扩建房舍,购置书籍经典,“士得屋以居,得书以读”。同时,请来儒生开坛讲授,以图加快更化湖南民风。

尽管两位僧人尽心尽力了,可毕竟规模太小,难以掀起波澜。宋仁宗赵祯年间(1022—1063年)成书的《武经总要》载,湖南“东界鄂渚,西接溪洞,南抵五岭,北连汉沔。其人多劲悍急决,勇于私斗……”这和《隋书·地理志》对湖南人“劲悍决烈”的评价如出一辙。

朱洞上任不久就深切地体察到了湖南民风的蛮横、彪悍。湖南西、南两边蛮夷“兼杂”,动辄“侵侵边境”,加之以前马楚等割据政权常年横征暴敛,导致人心向背、世道混乱,只要稍有风吹草动,便会纠集武力血腥争斗……朱洞有心开化民风,可是,官学未兴,良策难觅。

开宝九年(976年)十月,赵匡胤驾崩,宋太宗赵光义继位,兴建崇文院,编纂《太平御览》等书,增扩科举取士,宋朝明显地走上了“崇文抑武”之路。这时,曾在潭州一壑一丘寻迹山林的士人刘鳌敏锐地意识到,延续汉唐注疏的儒学传统即将走向多元义理探究,各种儒学思潮必将爆发、蓬勃,遂倡议潭州创建书院兴学。朱洞听后,与刘鳌的想法不谋而合,如磁石针。

朱洞在两位僧人办学的岳麓山下,增拓“讲堂五间,斋舍五十二间”,岳麓书院应运而生。一批又一批沾染“暴恶”习俗的湖南人,得以在这里潜心锻造,淳德教化。渐渐地,民风开始转折,湖南人用“心忧天下、敢为人先”替代了“暴恶”,迈着自信、坚毅的步伐从岳麓山下出发,昂首走上历史的舞台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,忘情地书写着一部湖南人专有的心灵史。

知潭州

范亚湘

文脉长沙

正因为历任潭州知州的接续发力,长沙儒学之风冒炽,民风得以淳化,破天荒地涌现出了一个人才“小高峰”。宋时,越来越多的长沙人迈着自信、坚毅的步伐,昂首走上历史的舞台,走向更广阔的世界……

是年底,朱洞离任,缺乏照拂的岳麓书院随即转入衰败,几近荒废:“诸生逃散,六籍散亡,弦歌绝音,俎豆无睹……”咸平二年(999年),坚信淳化民风乃是为政之本的廉吏李允则出知潭州,岳麓书院的惨状自此扭转。

《宋史·李允则传》曰:“允则不事威仪,间或步出,遇民可语者,延坐与语,以是洞知人情。”不要官威,乐意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民意,李允则难能可贵。

李允则上任伊始,湖南正闹饥荒,“欲发官廪先赈而后奏”,不想,却遭到了负责粮草运输的转运使抵制。李允则不忍眼见饥民饿死,只好“请以家资为质”,转运使态度逆转,“乃得发廪赈粜”。明朝末年,史家周圣楷在其《楚宝》一书里,专辟一节称颂李允则:“蠲除赈货,乃救灾第一急者。李允则先赈后奏,乃救时第一奇人!”

“湖湘多山田,可以艺粟。”首先,李允则削减苛捐杂税,兴修水利,“千里耕桑,润澈得水”。其次,

为了革新“民惰不耕”陋习,李允则责令农户必须每月垦荒种植上交马草。如此,“繇是山田悉垦”,百姓乐于其田,以至600多年后,冯梦龙在其《智囊》里还倾心称赞:“湖南无荒田,粟米妙天下。”

这两件事一做,李允则不仅打开了潭州局面,还赢得了民心。

一个秋日午后,微醺的李允则陶然登楼远眺,情不自禁地将目光锁定了河西岳麓山下那片被红枫遮掩的学舍。

“困顿如长夜,破晓终有时。”时机成熟,李允则着手扩修岳麓书院,

受到李允则的启发,仿佛北宋往后的潭州知州都善于顺势而为,不余遗力地去做一件事:办学兴教,开化民风。

嘉祐三年(1058年),王安石“变法”推崇“新学”,要求改变汉朝以来推行的庙学,废弃唐朝科举崇尚的山林土风之诗、赋,转而采用经义、论、策代替帖经、墨义,学子“无所不读”,学校变为科举当紧一环。

六年后,王安石举荐好友吴仲复知潭州,力图在潭州改庙学为州学,形成示范。”之明年正月,改筑庙学于城东南,越五月告成。”王安石听闻,情动了,赋诗《潭州新学诗并序》曰:“有嘉新学,潭守所作。”王安石称道吴仲复兴办州学,鼓励“潭之士子”奋发读书,“古之读书,凡以为己。躬行孝悌,由义而仕。神听汝助,况于闾里”,告诫“潭之士子”千万不要“无实而夸,非圣自是”。

随着王安石“新政”的失败和对辽国、金国战争的失利,北宋进入了动荡期,地方官吏变动频繁。从元丰七年(1084年)五月到元祐四年(1089年)七月,仅仅5年多时间,潭州知州就更替了6任,最短的一任路昌衡,待了不到4个月便被贬谪岭南而去。

纵使如此,几乎每任潭州知州都对教育情有独钟,仿佛教育是破晓之光,能够穿透墨染般的深邃,照亮前行之路。

北宋中后期,潭州已然有了一套完备的教育机制:“潭州三学”。《宋

经过一众武将的纵横拼杀,湖南日趋安定。

透过南宋疆域地图,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沙其时显耀的战略、经济地位。湘江贯通南北,是天然的黄金水道,北上,顺水直抵岳州(岳阳),入洞庭湖,东连江浙,西接巴蜀;南下,溯流过衡州、永州,经“北水南合,北舟逾岭”的灵渠威震岭南,遏制西南“蛮猺”。从而,长沙有了“岭南一都会,西南更上游”的美誉。

这等得天独厚的一方福地,潭州经济的发展似顺水行舟,不想朝前走都不行啊。其时,茶叶已是潭州主要税收来源,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载,南宋绍兴三十二年(1162年)潭州产茶103万余斤。何止是茶叶?“潭州三绝”愈是天下无以可与之相媲:“猫儿头笋,一枝重秤;敖黑潭取鱼,一网逾千斤;巨舰漕米,一载万石。”

潭州生产的矿冶、制镜、丝织、造纸、制砚、制墨等手工业制品风行全国。女词人李清照新婚燕尔,对镜梳妆,吟《丑奴儿》曰:“晚来一阵风兼雨,洗尽炎光。理罢笙簧,却对菱花淡淡妆。”雨后天凉,吹了一阵笙簧后,新娘坐到菱花镜前化妆,镜里镜外,一片迷离缱绻。巧了,李清照词中所说的那面菱花铜镜就是潭州制造,镜面锃亮,不但可照见美人的姣

“询问黄发,尽获其书,诱导青衿,肯构旧址”。“请辟水田,供春秋之释奠;奏颂文疏,备生徒之肄业。使里人有必葺之志,学者无将落之忧。”李允则将“学制”引入书院,确保了无论官员离任与否,都不至于影响岳麓书院的正常运营,可谓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长期困扰着书院师徒的生存之忧。同期,李允则还制订书院讲学、藏书、供祀等规章,上疏恳请诏赐义疏、史记、玉篇、唐韵等书籍,以图明确学子所学,昌炽儒学之风。

“瞻岳麓,有巍楼。”咸平三年(1000年),苏轼赞为“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”的名儒王禹偁乘着千禧之年的春风,游历到了文气氤氲的岳麓书院,见其规模、学风,犹如久旱逢甘雨,他乡遇故知,仿佛找寻到了一方心灵的乐土。王禹偁情不自己,油然而生一篇《潭州岳麓山书院记》曰:“谁谓潇湘?兹为洙泗;谁谓荆蛮?兹为邹鲁。”

“洙泗”是今山东省洙水和泗水的合称,因孔子曾在该处设坛讲学传道,故为儒学之代称;“邹鲁”意指孔子故里山东曲阜。王禹偁在考察了岳麓书院后,似乎发现了一条偏远、蛮荒之地朝向“儒学重镇”转型的开化路径,将“潇湘”“荆蛮”譬喻“洙泗”“邹鲁”,由此,长沙在“届贾之乡”之后又添得一个美称:“潇湘洙泗”或“荆蛮邹鲁”。

隔年,李允则奏请朝廷获准于岳麓山下另辟一地建立湘州书院,并将之纳入官学体系,进而与岳麓书院并立,相得益彰。一时间,岳麓山下随处可见“身着锦绣裳,书

史·尹谷传》曰:“初,潭土以居学肄业为重。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,升湘州岳麓书院生;又积分高等,升岳麓精舍生。潭人号为三学生。”潭州州学、湘州书院和岳麓书院三位一体,学生通过考试,以分数高低逐级安排“升舍”,岳麓书院升为长沙竟至湖南最高学府。

将近北宋立国中原之时,北方的辽国快速崛起,坐大,确立了宋辽两强的对峙局面。景德元年(1004年),宋辽签订“澶渊之盟”,之后一直相安无事。政和五年(1115年),辽国式微,金国兴起。5年后,北宋与金签立“海上之盟”,决议南北夹击辽国。又5年,辽灭,金兵转向南下,进击北宋。

宣和七年闰十一月丙辰日(1126年1月9日),金兵攻下都城汴梁。

次年,掳走徽、钦二帝,北宋覆灭。这一时期,北宋最后一任潭州知州曾孝序已是78岁的老人了,即使他是刚被解除贬逐“再知潭州”,雄心勃勃,夙夜不懈,意欲一番作为,可也只能强挺着一把老骨头遥对北方,“抬眼望,仰天长啸”。

“靖康之变”后,宋室南迁,南宋建立。皓首苍颜的曾孝序升任延康殿学士,在回朝途中被“青州民诣南都借留”,朝廷准许知青州,次月,遭部将王定叛乱挟持,拒降遇害”。

曾孝序一走,潭州知州空缺,狱卒、散匪、内乱不休。南宋建炎三年(1129年),向子諲“起复知潭州”。向子諲到,金兵亦到。“窥人双燕语雕梁。笑看小荷翻处、戏鸳鸯。”向子諲

容,还可照见潭州的繁华:“昔年假道过长沙,烟雨蒙蒙十万家。”

经济繁荣必然驱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、追寻,这是不二法门。乾道元年(1165年),知州刘珙敏捷地意识到了潭州社会的这一刚需,迅速“建立书院,立诸贤之祠,或刊注《四书》”。于是,荒在萋萋野草和地棘荆荆中沉睡,等待了30多年的岳麓书院被翻修一新,岳麓山下又可见身着青衫的翩翩儒生。朱熹《观文殿学士刘珙行状》曰:“潭州故有岳麓书院,公一新之,养士数十人,属张栻时往游焉,与论《大学》次第,以开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,闻者风动。”岳麓书院在理学宗师张栻的操持下,迎来了周式兴教150年之后的又一个高峰,学子逾千,盛况空前。“湖湘理学”变作一门显学,黄宗羲《宋元学案·南轩学案》曰:“湖南一派,在当时为最盛。”

“朱张会讲”犹似湘水和潇水相汇,两股激流碰撞交融,湘江浪花飞溅,汹涌澎湃。因开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交流,岳麓书院声名鹊起,德厚流光。当年,屈原、贾谊点燃了湖湘文化火种,“朱张会讲”将湖湘文化之火燎原、燃天铄地,如是,自由开放、兼容并蓄,求仁履实、经世致用的理念融入到了湖南人的血液里,湖湘性格渐露锋芒。

“朱张会讲”犹似湘水和潇水相汇,两股激流碰撞交融,湘江浪花飞溅,汹涌澎湃。因开创了不同学派之间的自由交流,岳麓书院声名鹊起,德厚流光。当年,屈原、贾谊点燃了湖湘文化火种,“朱张会讲”将湖湘文化之火燎原、燃天铄地,如是,自由开放、兼容并蓄,求仁履实、经世致用的理念融入到了湖南人的血液里,湖湘性格渐露锋芒。

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岂料,就在这紧要关头,刘珙受到孝宗赵煦褒奖,诏其立刻启程赴临安(杭州)担任制诰兼侍读。新任潭州知州张栻

生步态雅,口吟诗韵中,风度翩翩”的莘莘学子。

不久,朝廷派来状元及第的广南路(广西)转运使陈尧叟接任李允则一职,潭州百姓闻之,纷纷联名请愿,要求将李允则继续留任,并把列有李允则政绩、德行的请愿书转交给陈尧叟寻求呈报。民意殷殷,陈尧叟哪敢懈怠,赶忙上奏。宋真宗赵恒读到潭州百姓的请愿书后,甚是欣赞,召还李允则“连对三日”,并委以洛苑副使、沧州知州,镇守北疆。

与李允则“连对三日”,赵恒不但对潭州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,而且还多了一份垂念。

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“学行兼善”而被赵恒召入便殿。周式获授国子监主簿,可他坚拒不受,固执地请求回山执教。赵恒见周式恳切,感动不已,乃赐内府中秘书、鞍马和儒家《九经》,御书“岳麓书院”匾额以示褒扬。经历了这样高光、亮丽的时刻,“书院之称始闻天下”,“鼓瑟登堂者相继不绝”。

吟词笔下生花,却不见得通晓打仗,更何况还是对付从北方杀来的群穷凶极恶的狼。”金人围八日,登城纵火,子卿率吏卒夺南楚门遁,城陷。”向子諲逃跑后,潭州兵马都监王暕战死于潮宗门;守城将官刘酚身中数十矢,“挥兵直前”,阵亡……

金兵毁坏湘州书院、岳麓书院,焚掠6日后退去,向子諲“坐致至失落守职罢”。潭州又无主了,游兵、土匪等趁乱而入,再陷劫难。先是残兵杜彦自江西杀人,后是叛将孔彦舟挥师而来。朝廷令马友率部迎战孔彦舟,孔被击退,谁料马友摇身一变,高树反旗,不仅在潭州城内滥杀无辜,还下乡捕捉百姓勒索,“划刷金银,每二十人为一串,皆透手心,以索财之”。

绍兴二年(1132年)初,尚书右仆射(宰相)李纲失宠后知潭州。“鱼归江海身方适,鸟出樊笼意已舒。”初入长沙,李纲似有鱼归江海、鸟出樊笼之慨,乘兴率兵处死马友后招降其部将,“自是湖南境内溃兵为盗者悉平”。

“靖康耻,犹未雪。臣子恨,何时灭……”次年,岳飞知潭州,一边积极防备金兵再犯潭州,一边镇压西、南两边的贼兵游寇和洞庭湖区的农民起义军。宋室南迁改变了湖南的军事战略地位,潭州即是沿长江布防的六大帅府之一,变成“保有东南,控驭西北”的要津,因而,南宋另外两大抗金名将张浚、岳飞亦曾短暂知潭州。

祥获悉,赶紧联络张栻一起写信诚邀朱熹成行。“濯足夜滩急,晞发北风凉。吴山楚泽行偏,只欠到潇湘。”张孝祥早就情倾潇湘,显然不会轻易放弃这次宣扬潭州的绝佳机会。

乾道三年(1167年)八月,朱熹踏上了前往潭州的旅程。九月八日,金风吹拂,岳麓山上满山红艳,张孝祥和张栻恭迎到了朱熹一行。几天之后,长沙有了第一次剧烈的心跳:“二先生论《中庸》之义,三日夜不能合。”其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,朱张两人形影不离,朝夕晤谈、争辩,湖南各地儒生悉之蜂拥而至,岳麓书院“一时舆马之众,饮池水立涸”